

到灯塔去·新大众文艺

拍封面照时，温雄珍坐在自己的童装店里，瘦瘦小小的她，微笑地看着镜头，跟身后店里的衣服融为一体。很难想象，如此瘦小的女人，写出了那么多有力量的诗歌。

“如果不写诗，我的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。”温雄珍把诗歌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。写诗，让她有了喘息的余地。在热闹的白天，她是童装店的老板，是妻子、母亲；在夜晚或劳作的间隙，她是“生活的歌者”，是诗人。她的诗，治愈了自己，也照亮了他人。

15岁就来广东打工的她在，“打鸡蛋”“洗鱼头”“看一只麻雀”的生活里寻找诗意。在她的笔下，扫地的阿姨、开货车的司机、烧烤摊旁的烟、江边的风……都变得立体而有温度。

新大众文艺浪潮，给她的生活吹进一缕新风，分享会、座谈会、各种采访纷至沓来。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温雄珍坦言，对这些场合尚未适应，每次发言前都会紧张，但她对写诗这件事依旧满怀信心：“我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。”

其实在东莞，还有成千上万个“温雄珍”。她们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写作，写普通生活，写芸芸众生，写个体的困境，也写时代的回声。正如评论家胡磊所言：温雄珍的诗，写的是生活，是岁月，也是人世间。

贰
与诗歌相遇

小时候家里虽然生计艰难，父亲还是会花钱买书，《隋唐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……小时候家里有一箱箱的小人书，那是父亲给温雄珍最大的精神馈赠。多年以来，温雄珍一直保留着阅读的习惯。汪国真的诗集、三毛的散文选、鲁迅的小说集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、辛波斯卡的诗集……每本书她通常都会看三遍，她说，第一遍是看书，第二遍是读书，第三遍是思考。童年所有的困顿、孤独、人情冷暖，就这样在书籍的熏陶下，悄然变成了诗意的底色。

“如何让你遇见我/在我最美丽的时刻。”1992年，温雄珍第一次接触诗歌，是务工回家途中，在县城姑姑家看到一本席慕蓉的诗集。席慕蓉的《一颗开花的树》，在温雄珍心里种下诗歌的梦。“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，我很喜欢。”短短的句子，轻盈、灵动，不似她的生活那般沉重。温雄珍开始用诗歌安放自己的人生。

1994年，温雄珍在《江门文艺》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《如果》，书写情感的懵懂。

年轻时的温雄珍，总因自己不够看深感自卑。与心仪的对象约会时，她会故意晚到一个小时，用矜持、骄傲的姿态掩饰自己害怕受伤的心。“对方那么帅，怎么会喜欢我这样的人。”这种心态，让温雄珍

珍写诗时有了不一样的目标：“要提升自己的内在美。”

但对于只有小学学历的温雄珍来说，写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她用自己的方式学习，看电视记字幕、听歌识歌词，遇到完全不懂的就问一下别人。很多年后，她已经发表了很多首诗，偶尔还是会出错别字。

2012年，温雄珍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，她开始在QQ空间写诗。互联网渠道和平台，让温雄珍的诗歌，从个人爱好慢慢变成一种自觉的写作。

2015年是她诗歌写作的转折点，一个QQ好友把她拉进中国诗歌群，从此，她有了更多同路人。“来自江苏的‘瘦石别园’老师，经常指导我、鼓励我，带我去注册论坛、发表作品，由此我得到很多人认可。”

她不再是一个人“摸黑”写诗。她越来越懂得诗的本真，是从生活里生长出来的。“离你很近的诗，特别能打动人。有时候一些句子不是刻意写出来的，是自然蹦出来的。”从“扫地的阿姨”《老张》到《迷宫》《木质的肉身》《我在一首诗中想到叙利亚》，温雄珍的诗越写越开阔。

难怪文艺评论家、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胡磊说，温雄珍的诗歌有助于我们重新发掘后打工时代东莞文学的另一侧影。“东莞写作者

与写下生命的重诗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刘颖颖 实习生 朱莹文 图/唐德荣

了，才嚼得动。”11岁那年，母亲去世，温雄珍就用瘦小的肩膀挑起了沉重的生活。她顶着大太阳在田里割水稻，挑起粪桶时，担子举起来比她还高，两个桶得拖着地走。

因为交不起学费，温雄珍读到小学五年级时不得不辍学。“当时很想哭，但我也很理解我爸。四个孩子要养，他忙不过来。”

2003至2008年，是温雄珍最艰难的五年。丈夫有病痛，两个孩子还年幼，她必须兼顾带娃和摆摊。早晨，她用三轮车拉货，背着一个小孩，车内再坐一个小孩，一起出门摆摊。好天气时还算顺利，碰上刮风下雨则“很麻烦”。支撑她扛过来的，是一种“硬气”，也是一种解不开的责任感。

生活，锻造了温雄珍的力量与坚韧。如今，她一天还要做两份工。早上八点多到下午四点半，经营自己的童装店；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一点，在烧烤店打工。在童装店里，她麻利地卸货，把鞋子、衣服分门别类放好；在烧烤店里，她戴着橡胶手套，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滚烫的开水中快速搓洗抹布。体重不到一百斤的她，却可以轻松抬起几十斤重的木质大圆桌……

相比写诗，打工仍是温雄珍的重心所在。写诗，都是在打工的间隙完成。

温雄珍的童装小店没有名字，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的综合市场，不足10平方米，门口是马路，对面是市场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温雄珍吃住都在这里。前面是商铺，挂满衣服；中间是卧室，床下堆满货物；最后面是厨房。空间狭小、昏暗，即便是晴天，找东西还是要开灯。

为了扩大店面空间，温雄珍跟周围的商铺学到一招——在门口用两块木板支起一张桌子，上面摆满各式鞋子，卷闸门两边也挂满童装。作为店主和唯一的店员，童装店所有的业务都需要温雄珍一人承担。早上起来，拉开卷闸门，摆放好货物，然后去对面市场买份早餐，跟认识的人打招呼；中午有时候自己做饭，午休就睡在店里，开着。店里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个客人，她就看书、用手机写诗。

马路对面的市场，经常出现在温雄珍的诗中。“太阳从菜市场右

侧升起/它巨大的阴影/布满车轮碾动，和谈论蔬菜、肉类的价格/年轻的人总是步履匆匆/他们带动老人背步小小的震荡/许多车辆停下来，完成西门口的一阵吞吐。”这是诗，也是她的日常。

十年前，童装店还能挣到钱，她只在空闲时做点手工帮补生活。现在实体店生意不好做，她又给自己找了份工作，每天下午四点半去一家烧烤店打工。从童装店到烧烤店，需要走半个小时。温雄珍从不迟到，一到下午四点半，就关上店铺，背起双肩包，前往烧烤店。到底大概五点，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温雄珍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她跟店主一起把两张大圆桌抬到门口，把店里堆在一起的长条桌、凳子摆放开来。扫完地后，她又打一桶开水，戴着橡皮手套的手，在冒着热气的水中快速搓洗着抹布。“这样才搓得干净。”

经营烧烤店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温雄珍很欣赏他们：“两个年轻人，用自己的双手，在东莞买了

车买了房，真的很了不起。”其实，回望一路走来的历程，温雄珍自己也很了不起。

生活的种种苦涩与艰辛，都被她写进诗里。“生活/有时是一首快乐的歌谣/有时是一副沉重的担子。生活再沉重/我也不可能把你放下。”诗词里，她坦露自己的脆弱，也给自己一份力量。她说“痛苦就是诗歌的灵感来源之一”，但她更懂得把黑暗写进阳光中，把美好从艰难里提炼出来。她也从不把诗歌作为改变命运的工具：“从没想过通过诗歌赚钱，只想写好诗。”但她依然有一份关于书籍的梦想——“等经济条件好，孩子成家后，我想开一家免费的开放性图书馆。”现实尚远，她坦然接受：“但现在，还是得努力工作维持生计。”

“作诗，不为高尚，只是一种责任。”温雄珍说，只要生活本身尚有余温，她就会继续坐在东江边或者烟火气缭绕的烧烤摊边，在沉重与轻盈之间，为自己、也为更多素人，写下更有温度的诗。

●

随拍

荷挂雨珠

图文
刘 锡



荷叶上的闪亮无声地提示，大雨先于我造访。
俯身端详，每颗水珠都含着一个璀璨的梦想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地方文化符号的追寻

前不久去延庆参加一个文化活动，并与当地朋友就相关话题进行交流。我就地方文化符号的找寻、确立、阐释，谈了自己的一点看法。

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，传媒迅猛变革，迭代发展的今天，在努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进程中，在文旅结合成为普遍诉求的背景下，每个地方都在找寻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标识，总结地域文化特点，确立地方文化符号，通过文化研究加以归纳、概括、凝练，通过文艺创作加以弘扬和传播。

延庆，是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具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胜迹。著名的八达岭长城就地属延庆。延庆还有一个更具地方性的地名：妫(guī)川。这里还是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，也曾举办过国际性的园艺博览会。从自然到人文，

从古代到当今，引以为傲的文化名片很多。如何整合这些元素，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概括、提炼，并加以阐释，以精练的表达为地方找寻一张自认然并迅速传播的文化名片，则是需要与之相关的人士共同面对、共同探讨并形成共识的课题。

八达岭长城驰名天下。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14日在给延庆区的乡亲们回信中指出：“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，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、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。”回信还希望，要“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，弘扬长城文化，讲好长城故事……”

长城资源遍及全国多个省份。长城沿线的著名景观，当然是地方的，同时也是甚至更是中国的。延庆还在挖掘妫川文化，追寻妫川历史。今年，就评选并颁发了首届“妫川文艺奖”，既是鼓励文艺创作，也在彰显地域文化标识。

谢谢如《源如的书和我的书》两文，深切怀念这位老友。在前文中，叶灵凤告诉我们，谢谱如当年“家中富有”，他“戴了一副金丝眼镜，俨然是一位‘浊世佳公子’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家里的往来人物”，因此，瞿秋白有段时间得以在谢家安全隐居。而“谱如是一位爱书家。自从有新文艺出版物出版以来，不论是刊物或单行本，他必选每一种买两册，一册随手读阅，一册则收藏起来不放”。其实，鲁迅也往往是这样做的。

而在后文中，叶灵凤又告诉我们，“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那一段时间，这时正是上海新文艺出版事业最蓬勃的时代……谱如所购存的这一份单行本和期刊，是非常完整的，因此在参考资料上价值极大。尤其是当时各地出版的进步刊物，他购藏得最完整。这在其时还不觉得什么，时间一久，就成了重金难觅，非常可贵的文献”。叶灵凤说得很对，谢谱如这批珍贵的摄影印左翼文艺刊物，大多依据谢谱如这批珍藏。我们应该感谢谢谱如，也不应忘记叶灵凤当年的介绍。

叶灵凤是公认的散文随笔大家，这么多“霜红室随笔”就是一个明证。这些专栏文字，古今中外，天南海北，无所不谈，文坛艺苑掌故固然很多，中外书刊的考订和赏析也比比皆是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不断回忆自己当年的新文学创作历程，不仅提供文学史家所不知的史实，这就引起了我的进一步的兴趣。

譬如，上海藏书家谢谱如，现在已鲜为人知。叶灵凤在1965年5月16日和17日接连发表《爱书家

【夕花朝拾】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引资办厂的珠三角经验

据1984年媒体报道，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各县从1979年以来引进外资和设备办了许多工厂。这些工厂98%以上在签订合同以后都能迅速办起来，马上投入生产，很快受益。珠江三角洲现在这类工厂相当多，中山市(原中山县)有430家，东阳县有1030家。其中80%是区、乡办的，另外有一些是镇办的。这些厂引进外资、设备的形式，大部分是由外商提供设备，来料加工，然后从原料费中偿还外商的设备投资；另一部分是合资经营的。

当年这种情况引起了新华社的注意。新华社记者问有关同志：这些厂建成、投产、受益快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说，这些厂都是轻工业厂，设备小，安装快。它们基本上都是社队或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，建厂进度快了，得利快，反之，拖拉自己受损失。

对外商来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拖拉拉，他们就不和你合作了。从经营管理等方面看，办这些厂“婆婆少”。区、乡(公社、大队)办厂，报批手续简单，资金自己筹，劳力自己招，厂房自己盖，干部自己选。原料是外商送来的，产品也由外商经销，不经过我们的供销部门。这样来，每个

厂只有一个“婆婆”，即厂长。各厂在人事制度方面都坚持用人唯能，不看等级，不看关系。

顺德县龙江地区的龙江啤酒厂，是投资1260万元的中型厂。有人曾经说，这样的厂，应该派个县团级干部去当领导。这个厂没有同意，而是选了公社社工办公室的一个年轻人当厂长。这些厂是集体所有，不选能人办，亏了受不了。每个厂和外商订的合同是算数的，到时候拿不出货来，要罚就得罚，找个领导的条子也消不了灾。

这些厂在工资制度上，都打破了

平均主义。这些工厂的管理人员，大多只占全厂职工总数的5%左右，比同类的国营厂少一半到三分之二。

新华社1984年5月发文指出：珠江三角洲各县近年来引进外资和设备办工厂，上马快，受益快，他们的经验给人以启发。与珠三角相比，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工厂、大工程办起这类事情来，慢慢腾腾，从谈判到引进，从引进到投产，从投产到受益，一拖就是几年，十几年，把大好的光阴白白浪费掉，把自己的外商的积极性也拖掉了。



【夕花朝拾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烧瘾成灰

大约80%的不丹人有嚼食槟榔的习惯，因为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东部，是一个高海拔的内陆国家，嚼食槟榔能够帮助人们御寒保暖。

不丹一名中年女子曲珍，她向我忆述童年趣事：

“小时候，老是看到母亲的嘴巴不停地在嚼动，有一天，我好奇地问道：‘妈妈，你在吃什么呀？’妈妈把口中嚼了一半的槟榔渣吐在掌心里，塞进我嘴巴，让我嚼着吃。那股难以形容的奇异味儿，快速地从我的舌尖钻进我心里；从那时起，我便爱上槟榔了。那一年，我才七岁哪！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医学证明嚼食槟榔对健康有害无益；有些“瘾客”便主动与槟榔“划清界线”

这番话，蕴含着耐人咀嚼的智慧。

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回到复旦

这几天复旦大学群里，散居东西南北的同学在做一件事：接龙。确认是否住宿校内及在食堂就餐。昨天说，复旦校内的宾馆已经订不到单间，需要“合宿”了。去年就一直在说“大日子”该聚一聚了，但又懒懒散散，说老友聚，何时何地不重要。可忽然，这相聚的时间“被”确定了。因为复旦邀请逢五逢十的历届毕业生在校庆日返校，于是，从春末微澜，变成一桩确切的倒计时，新西兰、澳洲的同学们也出现在“接龙”行列里。

返校的时候，一定要去哪里呢？外观古典精致的中文系楼，坐落在大草坪旁，当年校园深处，除了老师，也是学生阅读刚出炉的文学杂志的地方，如今是复旦校史陈列馆；我们的第一堂课，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，朱东润先生捧着一叠书，站上了讲台；相辉堂是大礼堂，站上了去的，前阵子还在上演戏剧，当年的穹顶朴素无华，记忆最深的，是谢希德校长的讲话，简短、优

雅，逻辑的力量溢出言语的河流，直入心灵。毕业那一年，校园里大水不退，似乎我还有一张蹲在曦园水边，对视波光粼粼倒影的照片。还有每到晚间，食堂阿姨在教学楼前轻轻摇铃，勾魂一般，却舍不得去享受食品车上那些蛋糕和夜宵。我们住的四号楼，拆了一半，留下一半……一晃，四十年的光阴，收束成一道弧形轨迹，我们这群中文系1985届的老学生，如今成了自己笔下描绘过的“时空褶皱样本”。而且那些充满细节的记忆，在不同同学的记忆对质锤炼下，真相竟也杳无踪迹。那些采购自复旦书店五角场的《朦胧诗选》《西方现代派作品选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等等，已经书页泛黄，却仍驻留在书架上……最近在小说里也经常读到诗，“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，无缘无故地走，是为了归来，所有的出发，也都暗含重逢的期许。毕竟，时光化为灰烬，也筛漏下原初的动人瞬间。”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你的所有表达，比不上你做过的任何一件具体事。”要保持言传身教。课堂上讲得再天花乱坠，实践如果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，还是被卷得失去眼里的光，学生会信你吗？讲台上上下都被困在系统中，只会做“课题”的教师，教出只会应试、答题的学生，而都没有学问（内心都没有问题，都不会“发问”）。立德树人，首先自己要能立起来，成为一棵树，在你思想的树荫下去树人立人。

老师要让自己所教的课程，成为一个旷野。否则，学生会充满疑问，老师讲了那么多，鼓励我们放荡不羁爱自由，但最后还不是用分数去评价学生？老师改变不了“社会大系统”，但可以让这个最终的分数中包含更多元的评价体系。那个分数，不是一个是模板，一种套路，而包含着对思想的接纳，对个性的包容，对旷野的鼓励。

老师还要通过创造表达的平台，让学生看到“成功有很多种方式”。比如，

老师的言传身教
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鼓励学生多写评论，多在媒体上发表，去与真实的社会形成关联，让自己的表达被社会看到，并得到反馈。这几年我很欣喜地看到，很多大学生在这些舞台上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，闯出了“江湖地位”，一毕业就拿到了媒体的offer（录用），成为优秀的评论员。有学生通过这种表达尝试，发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兴趣和优势，树立了表达的自信，考研和就业有了清晰的奋斗方向。还有通过评论对时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，有的通过评论结识了其他大学志同道合的评论爱好者，有的通过参赛养成了每天千字的写作习惯。养成写作习惯的学生，